

目 录

第一章 贵州工人阶级的产生和早期工人斗争	(1)
第一节 贵州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出现和产业工人群体的形成	(1)
一、工场手工业工人队伍的发展	(1)
二、产业工人群体的形成	(3)
第二节 早期工人的政治和劳动生活境况	(6)
第三节 工人斗争	(10)
一、1900年万山汞矿工人反对英法掠夺者的斗争	(10)
二、1908年黔东南排筏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	(11)
三、1909年镇远工人参加捣毁百货厘金局的斗争	(11)
四、1919年贵阳、遵义等地工人声援“五四”运动，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11)
五、1927年遵义丝织业工人求生存而进行的罢工斗争	(13)
六、1933年赤水兵工厂工人的反迫害斗争	(13)
第二章 红军长征对贵州工人运动的影响和促进	(15)
第一节 红军宣传革命真理，工人自发支援红军	(15)
第二节 遵义赤色工会的建立	(18)
第三节 黔东革命根据地颁布工人保护条例	(21)
第四节 推动工人斗争	(24)
第三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贵州工人运动	(27)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工业和职工队伍的发展	(27)
第二节 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30)
第三节 参加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	(33)

第四节	解放前夕开展反搬迁、反破坏的护厂斗争	(37)
第四章	贵州解放,工会建立,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 巩固人民政权而斗争		(42)
第一节	贵州工人阶级的解放	(42)
第二节	组织起来,建立工会组织	(44)
一、	贵州省职工联络处的建立	(44)
二、	自上而下工会组织体系的形成	(48)
第三节	面向生产,战胜困难,促进经济好转	(50)
一、	工人阶级在向困难作斗争中的卓越表现	(50)
二、	开展爱国增产节约劳动竞赛,第一代劳模的涌现	(53)
第四节	参加抗美援朝和各项政治运动	(57)
一、	开展抗美援朝运动,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	(57)
二、	发动群众参加民主改革	(61)
三、	投入“三反”、“五反”斗争	(66)
第五节	工会建立后对工人利益的关心和促进	(70)
一、	救济失业工人	(70)
二、	贯彻实施劳动保险条例	(73)
三、	维护工人利益,促进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的改善	(76)
四、	开展职工政治、文化、技术学习活动	(81)
第六节	省工会首届代表大会召开,省总工会成立	(84)
第五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贵州工会工作	(89)
第一节	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	(89)
第二节	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93)
第三节	广泛发动群众,实现“一五”计划	(99)
一、	劳动竞赛、技术革新运动的开展	(99)
二、	省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03)
三、	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兴起	(106)

第四节	全省第一次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	(110)
第六章	贵州工会运动受“左”的影响和在大跃进中的活动及挫折	
第一节	反右斗争与工会,省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15)
第二节	省总工会党组扩大会的错误	(119)
第三节	大跃进中的工人阶级和工会	(123)
一、职工队伍迅速扩大,开展新工人教育	(123)	
二、职工群众可贵的积极性和受经济建设冒进的影响	(127)	
三、工会的“消亡”与恢复	(131)	
第四节	经济调整中的工会工作	(136)
一、做好收缩职工队伍的工作	(136)	
二、大抓职工生活,渡过难关	(139)	
三、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复苏	(144)	
第七章	工人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广大	
职工迎着困难投入三线建设	(150)	
第一节	“文革”对工人运动的冲击和破坏	(150)
一、职工队伍被分裂	(150)	
二、工代会的出现及其主要活动	(152)	
三、极左思潮在工运领域的泛滥	(154)	
第二节	职工在动乱中坚持生产,省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156)
第三节	三线建设的展开与贵州工人阶级的贡献	(161)
一、一支精良的现代产业职工队伍支黔	(161)	
二、艰苦创业,在三线建设中立功勋	(164)	
第八章	工运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会工作的重大转折	(169)
第一节	揭批“四人帮”对工人运动的破坏,整顿工会组织	(169)

第二节 贯彻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消除工会领域中“左”的思想影响	(172)
一、明确工运思想理论是非,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72)
二、省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76)
第九章 贵州工人运动在改革开放中开拓前进	(180)
第一节 群众生产运动在振兴贵州经济中的新发展	(180)
一、为四化立功竞赛的广泛开展,“五一”表彰制度的建立 (180)
二、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出现新的活跃	(186)
第二节 推动“四有”职工队伍建设	(189)
一、加强新形势下的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189)
二、职工读书活动的兴起	(194)
三、推进职工教育	(198)
第三节 省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201)
第四节 工会参与活动的发展	(204)
一、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的推行与发展	(204)
二、工会参政议政迈出新步伐	(209)
三、工会在关心和维护职工利益中发挥积极作用	(212)
第五节 建设“职工之家”,发展工会事业	(217)
一、在基层工会开展建设“职工之家”的活动	(217)
二、工会事业的发展	(221)
三、省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指导下开创工人运动新局面	(228)
附录:	
一、贵州工运大事记	(233)
二、贵州省工会组织史资料	(316)
后记	(347)

第一章 贵州工人阶级的产生 和早期工人斗争

第一节 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出现和 贵州产业工人群体的形成

贵州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萌芽和发展起来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原来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贵州由于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和高原山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和其他历史原因，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较沿海地区缓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大约比先进地区要晚三、四十年。产业工人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

一、工场手工业工人队伍的发展

外国资本主义进入，先是在商业、流通方面，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英国的纺纱、荷兰的棉毛纺织品即已输入贵州。七十年代以后，开始大量倾销，品种也增多，贵州已成为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印度倾销产品的主要市场之一。与此同时，本省商业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仅贵阳市商户就扩大到 300 多家，经营规模也增

大,雇佣劳动者大量出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和发展起来,起初是出现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从小到大。按清政府 1911 年规定:“凡一户之制造品,有 7 人以上工作者均得称工厂(即工场)”的标准,全省已发展到 120 家手工工场(作坊),有工人 1578 人,平均每个工场 13 人以上。其中,织造工场 29 家,工人 264 名;器具工场 4 家,工人 57 名;化学工场 43 家,工人 636 名;饮食工场 22 家,工人 207 名;杂工场 2 家,工人 24 名。在 120 家工场中,除少数为官办外,绝大多数均为民营手工业工场(作坊)。比如酿酒业,仁怀县茅台镇的“成义”和“荣和”两个烧房,就是较大的手工业民营工场。“成义”于 1863 年创办,“荣和”1873 年创办,到 20 世纪初,两工场年产量合计一万斤左右,之后,茅台酒成为世界名酒(1915 年)后,烧房林立,酿酒工人成倍增加,达到年产二、三十万斤。1880 年有数据表明,全省从事丝织业的工场和作坊有 100 多家,其中遵义地区占 10 多家。至 1914 年,遵义城已有丝织工场 65 家,工人二、三百人。较有名气的如“义安公司”,拥有资本 4 万多银元,有工人 200 余人,由日本留学生况良士指导生产,使用较为先进的摇机织绸。还有“同昌行”,置机 10 多台,有工人七、八十人,专织宽府绸;“协记”工场里置机 10 多台,工人二、三十人,生产府绸、丝帕、丝线;“任氏作坊”有织机十几部,有工人 20 余人。1905 年,遵义、铜仁地区还办有“百艺工厂”、“警务工厂”、“劝业工厂”(培养技工)等。另有地主官僚和商人投资办矿业,进行开采冶炼,如铜仁万山就有 10 来家民营汞矿。其中老山坑和黑洞子汞矿,雇工 100 多人。开阳、八寨(今丹寨)、三合、册亨、兴义、安龙等地也兴办了汞矿。全省汞产量 6 吨多。威宁、镇远、三穗、玉屏一带办有炼铁厂,有工人多达数千。此外,一些地方还有林场及航运业等。这些手工业工场和行业已进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行列,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工场逐渐改变手工操作方法,开始接受技术改

造。有的如棉纺、丝绸、印刷等初步使用半机械工具，一些工人技师已懂得基本的化学处理方法，生产分工更加明确，并出现了兼并和扩大再生产，使工场或作坊发展成近代工厂，手工业工人也成为掌握先进技术的劳动群体，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形成而变为近代产业工人。

二、产业工人群体的形成

近代工业(机器生产)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产业工人也由此产生。贵州近代工业最早始于1886年青溪铁厂的开办，这是贵州机器生产的开端。这个厂是官商合办的；是在当时兴起的洋务运动的影响和刺激下办起来的，目的是要“力敌洋庄，收回铁利”。经清政府批准，在青溪(今镇远清浪区)设立“炼铁总局”，于镇远、常德、汉口、上海布置分局。资金来源靠招收商股，“每股银100两，共招3000股，合银30万两”。“股分最多者推为总办，其余，一人能集百股者作帮办”。实行中，只招到省外商股5万两，省内商股5万两，共计10万两，数不足“挪用公款19万2千两”，投入筹建工程。机器设备是从英国购进的，经上海、湖南由水路运至青溪，有“大炉一座，每日夜应炼生铁25吨”，“炼熟铁炉8座”，“别色麻炉2座，每两刻能炼钢1吨”，“轧条机13副，轧板机1副”，共重1780余吨，价值12610英镑。厂房占地60多亩，招收冶炼的固定技工近千人，加上采矿临时工共约5千多人，另从上海聘请英法工程师5人，从浙江等地雇来一批技术人员和工匠。青溪铁厂“规模之大在当时全国中亦为仅见”。经5年筹建，炼炉于1890年正式出铁。然而好景不长，后因生产资金不足，技术人员缺乏，煤源太远，运输困难，加上后继主办人玩忽职守，亏欠公银，使仅出铁一个半月的青溪厂，即萎缩不振。延至1893年即全部停产，造成贵州第一个最大的近代工业企业的夭折。工厂停产后，改为民

办,分散经营,持续了较长时间。

1899年,英法水银公司在万山成立,这也是贵州早期的近代工业企业。当时英法总投资750万法郎(约为28万银元),其中法国占五分之三,英国占五分之二。经二年筹建,于1902年正式采矿冶炼,该公司的采冶技术在当时也算是先进的,如用十多人手摇钻机(人称金刚钻),可钻矿30米深,爆破用黄色炸药(T.N.T.),运矿有铁轨木箱车,炼汞有两座机械炉等。公司有矿工1千多人,并雇有数百童工,管理人员30多人。至1906年,英法掠夺者被赶出了万山。之后,这个矿便经历了30多年分散开采的民营时期。1938年由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和贵州矿务局接管,成立官办企业,1946年又改为合资经营,直至解放。

二十世纪初期,贵阳先后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小厂。1908年,贵州巨商华之鸿投资20万两白银,创办了文通书局印刷厂,机器设备是从日本全套购进的,并派人去日本学习印刷技术和影印、制版技术,还聘请日籍技工随机器来贵阳,1911年投产。开始时招收学工70人,加上副工、木工、校对及管理人员约百人左右,这是贵阳较早出现的产业工人。1915年,贵阳又兴办了永丰造纸厂,机器也是从日本买来的,1919年开工生产,建厂时有工人60多人。这一时期,还有一富商投资5万银元办起贵阳皮革有限公司,有机器6部,雇工数十人。以及后来出现合资创办的贵阳制革公司,有技师徒工数十人。还有大同制革厂和永丰皮革厂等。这些制革企业,多以制鞋为主,兼有其他革制产品。1917年贵阳商人创办了织袜厂,有沪产织袜机10多架,工人一、二十人。1932年贵阳兽丰布厂建立,有铁机11架,过纺机2架,输机1架,倒纺机20架,有工人45人。1915年,一些商人集资白银3千两,成立了贵阳惠川火柴厂,有切梗机等,工人80余人。1918年,商人集股筹资白银1万两,开办协昌火柴厂,有切梗机、推片机各2架,工人170多人。

1921年，遵义县也办有两家火柴厂，之后又出现缫丝厂等。上述一些工厂，有的以机器生产为主，有的机器、手工兼有，或以手工操作为主，但在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已具有近代工业的雏形。

辛亥革命后，1923年贵州军阀周西成，为扩充军事实力，在赤水创办兵工厂，由商民集股承办。机器设备和发电设备、钢材是由上海、武汉等地采购进来的，其中车床、铣床、磨床、刨床、蒸汽发电机组，为英、法、日产品。建厂时，全厂员工共一、二百人，后逐步发展到一千多人。兵工厂分设7个棚（车间）生产。另外，还有一批建筑工人负责厂房扩建和维修。该厂生产有步枪、冲锋枪、手枪、自动步枪、马克辛机枪以及各种子弹、手榴弹等，每月平均生产枪三、四百支，最多每月达到2千支。后来，又增设硫酸厂、白药厂（炸药），工人达到二、三千人。1935年四川军阀刘湘接管了这个厂，将全部机器设备运往重庆。原厂技术工人由周西成调去贵阳办兵工人，其余四、五百工人流落社会。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贵州电力工业也已兴办起来。1917年，贵阳商界熊静安等34人发起筹建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从上海向美商慎昌洋行订购两套75千瓦直流发电机及锅炉附件，由于军阀混战搁置镇远。直到1926年，周西成主持建立贵州电气局筹备处，次年将设备运抵贵阳，招募工人40余人，1928年发电，年发电量30万度。由于机器锈蚀，在安装过程中，工人悉心钻研，攻破道道难关，最后才调试成功，从而造就了贵州第一支电力技工队伍。同一时期，贵州也开始有了近代邮电通讯，邮政工人已在高原山区出现。近代交通运输建设，始于周西成主政贵州的1927年，他先在贵阳修环城公路，接着，以贵阳为中心，修建了南到独山，西到黄果树，北到赤水的公路干线。1930年第一批载重汽车（19辆）在贵州出现，次年增至50辆，并相继有了汽车修理、汽车配件生产等工厂。加上造船、航运工人等，形成了早期的交通运输产业工人队伍。

上述史实表明，贵州产业工人除个别外资企业和少数官办企业外，大多数是伴随一部分商人以及地主、官僚等私人投资兴办的一批近代资本主义工矿企业出现的。同沿海等先进地区相比，其差别是：1、产生的时间将近晚半个世纪；2、发展缓慢，数量少，占全省人口中的比例很小；3、阶级队伍形成的时间不长，受到锻炼也较少。4、多数由手工业工人转化而来或来自破产的农民。然而，由于他们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仍然是新的、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在社会化生产中劳动而没有任何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雇佣奴隶，当然也是最富有革命性和最有前途的阶级。

第二节 早期工人的政治和劳动生活境况

贵州工人阶级一诞生，就深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磨难和军阀、封建反动势力、资本占有者相互勾结的野蛮统治。如果说中国工人阶级在旧社会长期都是处在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苦难之中；那么，贵州工人阶级特别是早期工人所经受的苦难则更为深重。

早期工人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是雇佣奴隶。统治阶级采用最野蛮的手段，残酷地压迫着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他们无政治权利可言，甚至连人身自由也无保障。贵州在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过程中，官僚、资本家仍沿袭封建制度中的统治手段，压迫和残害工人。这种情况在汞矿、煤矿等矿山上表现尤为突出。从事开采、冶炼的工夫承受着极其艰苦而繁重的劳动，资本家和骑在工人头上的监工、管班和把头，只知诈取工人的血汗，而不关心工人的死活。工人稍有不顺，就受惩罚，如有抵制或反抗，就被鞭打、戴枷、游街以致坐牢。贵阳筑东煤矿就私设有牢房，工人被

关进牢房后，只能站，不能坐，也不给水喝，不少工人被折磨至死。万山汞矿对工人采取的高压奴役手段，极为残酷。为了惩罚工人竟私订土刑法 18 种之多，如有：背“火背箩”，灌辣椒水，香熏眼睛，站笼子，上滚筒，上排杠，铁丝穿耳，砍扁担，关黑牢等，受此残害的工人不计其数。赤水河上的封建把头也是通过施行十多种刑罚，对船工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赤水兵工厂为“官督商办”企业，对工人实行严密监视，用驻厂军警限制工人行动自由，工人进厂就被严加管制，如坐牢房。一些工厂甚至规定工人在学徒期间，不准结婚，不准探亲访友等等。总之，工人政治权利完全被剥夺，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奴隶。

由于劳动条件极差，生产无安全可言。矿山就不用说了，一般工厂也是无固定厂房，多是利用空房旧屋、庙宇祠堂，场地狭窄，设备简陋；空气污浊，阳光缺乏，灰尘弥漫，臭气熏人。万山汞矿工人下井采矿，如同进入地狱，矿井里充满了矽尘和桐油烟子，不见天日，资本家连矿柱都不装，工人整天处在死亡威胁之中。所谓“洞外一死，洞内三关”就是工人在矿山劳动环境险恶的真实写照。洞外一死是指工人炒制黑炸药时引起燃烧，造成伤亡事故；洞内三关是：1、打炮眼装炸药引起爆炸；2、处理瞎炮时发生迟爆；3、放炮后岩石松动塌方，压死工人。如在英法水银公司时，大泥哨洞塌顶，压死 40 人，大水洞塌顶压死 20 多人，滑石坡塌方压死 40 多人，岩屋坪牛鼻子洞垮塌，压死 30 多人。水城万福银厂因火龙洞石壁崩塌，一次压死矿工多人。那时在矿山里是：“事故如牛毛，人命如稻草，说起伤心事，矿工泪滔滔”。因为劳动环境劣，矿工的职业病也极为严重。许多矿井无通风设备，亦少通风之孔，隧道遂曲，洞内窒息难忍，加上油烟和放炮产生的烟雾，工人成年累月劳动，身体再好只要三、四年就得烟子病——口吐黑痰，牙落舌烂，肺叶硬化，呼吸困难，无药可治。民生公司经营的岩屋坪汞矿，雇工 79 人，得烟子病

的就有 48 人。炼汞工人得汞中毒者更是比比皆是。煤矿由于无安全设施，伤亡事故经常发生，矿井内又黑又脏，工人赤身进出，被称为“煤牛”。工厂比矿山好一些，但情况也是严重的。一些手工或半机械生产的工厂，如冶炼、酿酒、缫丝等厂，工人长期在高温下劳动，得不到一点保护，经常发生身力不支而晕倒。缫丝厂的女工和童工两手终日泡在热汤中，手掌结成干茧，皮肉难分。

生产劳动时间长是另一个突出问题。汞矿实行“里工制”，“里工”作息时间是：每日清晨 6 时进洞打眼—10 时量炮—11 时出洞用餐—12 时再次进洞—下午 4 时出洞用餐—6 时又进洞—到晚上 10 时收工，每天劳动 12 小时以上，叫做“上三班”。一般工厂的劳动时间都是由资本家随意规定的，最短也在 10 小时以上，长的每天达 20 小时。贵阳印刷业男工每天上班 19 小时，女工、童工也达 14 至 16 小时。贵阳纺织业男工每天劳动最短的 14 小时，长的 20 小时，女工劳动 11 至 18 小时，所有工人每年只放 4 天假，全年劳动 361 天。遵义地区酿酒、冶炼工人，在高温条件下，每天也要劳动 14 小时以上。青溪铁厂炼铁工人每天 24 小时分两班，每班 12 小时；烧锌工人劳动不分白班、晚班，累了只能倒在炉边打一下盹。有的工厂老板采取计件办法，如纺织厂织一匹布或绸，按规定需几日完成，给工钱多少，使工人为资本家日夜拼命。

工人虽然付出极大的劳动量，但收入却少得可怜，劳动成果被剥削者最大限度地榨取，因此生活十分困苦。那时，汞矿实行“实物分成制”或叫“锤户制”，铅、锌、锑等矿也采用此类制度。所谓锤户，通常由 4——6 人组成一把锤，由锤首向矿主填写“包采志愿书”，条件苛刻，连采矿用的工具、炸药等均由锤首自备，工人采出的矿砂和炼出的汞，矿主要抽利三次：一次抽地息，二是上灶抽利，三是抽头。如采一场砂，100 斤要抽 10 斤，加上矿主低估品位和扣除冶炼时的消耗，工人只能得极少量的回收率。清代商民开办的凯里永

兴铅厂，工人在采出铅矿之前，厂方只供工人吃饭，不发工资，出矿砂之后，才开始计酬。航运方面，由于木商老板和包工头的重重盘剥，使运输工人工资低得无法养家糊口。榕江县搬运工人每搬运100斤货物，只能购买大米2斤半。民国初期锦屏一家缝纫工厂，厂主曾荣昌，人称“饿老虎”，一年之内就要从工人身上榨取利润1250元，等于他支出工人工资的4.9倍。遵义德泰火柴厂工人月薪只有2—3元。丝织业工人每月工资只勉强维持两口人的最低生活，无力顾及赡老养小。尤其是到了老年，或伤病丧失劳动力后，即被业主解雇，往往流离失所，有的沦为乞丐。

工人的居住情况十分悲惨。特别是矿工，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如汞矿工人，大都住在废弃的矿洞里藏身栖息。万山扁口洞、仙洞、大岩洞、小岩屋等处的岩洞，都是矿工集住的地方。有的在岩边搭个窝棚，就算是很好的了。即使这样，地主、资本家还要收他们的“洞租”、“地租”。矿工何老满一家住在岩屋坪一个破烂不堪的矿洞里，矿主还要他每年交洞租两斗米。矿工何老贵住在前后通风的岩板下，每年也要向地主交四斗包谷的租。煤矿工人多是挤在“千柱落地”的窝棚里，睡通铺，盖稻草。铅锌矿是“师付睡大盘，工人睡炉脚”，天冷时二、三人合盖一床“秧被”。不少矿工连裤子都没有穿的，以麻袋裹身。苦难的矿工不断发出怨恨之声：“说起矿工苦，两眼泪滔滔，穿的麻袋片，住的岩洞和破窑，吃的瓜菜耙，盖的秧被睡稻草，受尽老板欺，还有管班、把头把我敲，生活如牛马，满腔怒火恨难消”。在工厂或工场里，当时连厂房都是破烂房屋，工人的住处就更不用说了。许多工厂是只管工人劳动，根本不管工人住房，原来是穷苦农民或城市贫民当了工人后，由于无住房，疲于奔命上班，增加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第三节 工人斗争

贵州工人阶级的产生几乎与工人斗争是伴随而行的。早期工人的斗争，多是自发的，局部的。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从有了工人阶级之后，工人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始终是工人自我教育和促进工人运动发展的推动力量。有史料记载的工人斗争事例如：

一、1900年万山汞矿工人反对英法掠夺者的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沿海逐渐进入内地。1899年，在贵州万山建立“英法水银公司”，目的是掠夺贵州汞矿资源。矿工们对“洋人入矿界”进行经济掠夺和对矿工的压榨极为愤恨，于1900年秋，在义和团的影响下，联合起来，进行了武力反抗。先由支持矿工的小矿主杨光容暗地购买枪支，聚集七八十名矿工，赶走了保护洋人的清兵，收回了大、小矿洞，当正准备要将英法商人逐出万山时，英法水银公司请铜仁“总兵”林觉派兵前去镇压，致起事未成。但尽管如此，矿工们显示出的声威，却使洋人从此胆颤心惊，吓得他们晚上不敢出门，白天不敢远行。并且，矿工们还以离开矿山，不为洋人卖命等方法，继续进行斗争。经过几年较量后，清政府终于在万山工人反抗斗争的强大压力下，于1905年查办了保护洋人，卖国求荣的官吏陈明远，1906年向英法水银公司收回了采矿权，使洋人在1908年停采矿砂，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这次斗争，是贵州工人最早吹响的反压迫、反掠夺的号角。

二、1908年黔东南排伐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

由于不堪木商老板对船工肆无忌惮的压迫和剥削，1898年，黔东南清水江上的水运工人在彭守敏的带领下，聚集于茅坪、宰贡（天柱）地区，拦江阻木，同当局抗争，要求增加工资，后因力量单薄被镇压而失败。此后，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复于1908年4月再行起事，“在茅坪排墩齐集百余人，各执刀矛洋炮，对卦治（地名）下放之木，概行截止，不准放行，希望增加墩价”。这次用武力进行的斗争，声威大，力量强，终于迫使黎平府同意水运工人与木商协议。木商惧怕工人的威力，接受工人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其中卦治至茅坪的运资由每排100文增至120文，茅坪至宰贡的运资，由每排60文增至80文。

三、1909年镇远工人参加捣毁百货厘金局的斗争

清末时期的百货厘金局的收税机关，为了搜刮民脂民膏，到处设置关卡，来往船工即使捎带少许物品，也不能逃脱他们苛捐杂税的勒索。1909年4月的一天，停泊在镇远城边的数十只木船船工和城内工人，在长期积怒之下，齐奔厘金局所在地，将该局的五间房屋推倒焚毁，并实行全城罢工罢市，强烈要求取消厘金局，并表示不达目的决不复工复业，镇远太守原拟派兵镇压，后见群情激愤，来势很凶，只得接受工人的和市民的要求，撤销镇远百货厘金局，工人直至取得斗争胜利，才复工复业。

四、1919年贵阳、遵义等地工人声援“五四”运动，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进入民主革命时期，工人斗争进一步发展。1919年，中国在巴

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贵州高原也为之震撼。同年6月1日，贵阳工人、店员和学生、工商各界群众，聚集于梦草公园（现中山西路），参加贵州国民大会成立大会，会上一致要求以实际行动争国权，惩国贼，挽回外交失败，并以快邮代电向全省全国通报。会后，有3千多人手执“声讨卖国贼”，“不还青岛誓不休”、“力争主权，发扬民气”等三角标语旗，上街游行，有的发表演说。不少商店关门歇业，以示抗议，广东街（今中华北路）一家理发店贴出了“国事如此，无心经营”的启事，有的街上贴出“提倡实用国货，禁止出售日货”的标语。游行队伍所过之处，市民倾家而出，表现出高涨的爱国热忱。6月3日，在北京读书的遵义学生张继芸、晏平全等30余人联名发回通电，寄回几十张宣传品，号召家乡人民行动起来，支援北京“五四”大游行，投身反帝爱国运动。6月19日，遵义工人和学校师生2千多人，高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夺回山东青岛”的大标语，走上街头，进行宣传活动，各业工人、店员也纷纷响应。6月23日，遵义两家丝织厂30多名工人举行集会，宣布罢工，全城百货、布匹、医药三个行业的大部分商店，带头罢市，继而发展到全城18个行业的许多商店罢市。6月25日，群众把查出来的日货在大街上当众烧毁。当局见此又急又怕，遂对示威者实行镇压，丝织厂一工人因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被暗杀。虽然如此，工人、学生仍未屈服，顶着压力继续斗争。查禁日货先后持续一个多月，并使以后一年多时间日货在市面上绝迹。与此同时，在镇远、铜仁、兴义等地的工人、学生也开展反帝爱国斗争。斗争既教育了广大职工群众，又抵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促进了贵州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据统计，“五四”前，遵义经营百货、布匹等国货商店有41家，到1921年已增加到56家，遵义丝织业也增至62户，织机增至150多部。